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名家文集

何耀华文集

(第三编)

何耀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名家文集

何耀华文集

(第三编)

何耀华◎著

■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耀华文集/何耀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203-0827-4

I. ①何… II. ①何…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43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5.25
字 数 1648 千字
定 价 538.00 元(全五编)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三编 藏学研究

关于建立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藏学问题	875
论藏区的远古文化遗存	879
古代羌人与青藏和川西土著居民的融合	899
早期吐蕃史事考	928
论松赞干布的统一事业	947
论文成公主入藏	960
论金城公主入藏	976
西北吐蕃诸部与五代、宋朝的历史关系	995
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	1020
川西南藏族历史初探	1038
多须人的起源及其他	1043
浅析纳木依人的本教	1045
四川冕宁县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1054

喜读《西藏研究》创刊号	1122
香格里拉藏族传统环保观	1125
印度东喜马拉雅民族与中国西南藏缅语民族的 历史渊源	1129
中印边境人种文化的亲族关系	1141
中甸（香格里拉）藏区考察纪实	1159
边区藏民甜蜜的家——中甸（香格里拉） ——台湾《大地》杂志特约稿	1175
《云南藏族》电视纪录片解说词	1200

第三编

藏学研究

关于建立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藏学问题

按：1986年7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西藏师范学院、西藏自治区民委、西藏社会科学院筹备组联合召开全国首次藏族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议筹备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民委从各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31人。来自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贵州、广西、广东、辽宁、湖北、北京等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藏、汉、满、壮、回、彝、苗、布依、侗、土家、白、纳西等12种民族成分，其中来自西藏和全国各地的藏族学者51人，占代表总数的40%。除中央及有关省、市、自治区科研单位和民委的代表之外，还有大专院校、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及宗教界的知名学者。全国这么多学者来到拉萨欢聚一堂，讨论藏族学术问题，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此文是我提交给会议的文稿。

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藏学，是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一项光荣而迫切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藏学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方针，研究藏族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从神学史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揭示西藏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研究西藏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研究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语言、

科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当前特别要注意研究西藏“四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服务。

不言而喻,这里提出的要建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藏学,不论在指导方针、目的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是和西方的所谓“藏学”有根本区别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股“藏学”热,美国、法国、英国、日本、匈牙利、苏联、意大利、丹麦、捷克、东德、蒙古、波兰等14个国家,1976年在匈牙利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发表了关于“藏学”的报告和论文40篇。1977年6月,瑞士苏黎世大学发表关于召开一次青年“藏学家”讨论会。有瑞士、西德、奥地利、意大利、英国、瑞典、挪威、美国、丹麦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和论文。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民族博物馆被认为是西方的“藏学研究中心”。日内瓦还成立了一个“高级西藏中心”。有20多个国家先后建立了关于西藏的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创办各种刊物,发表了不少研究西藏的文章,这些刊物除个别对我国较友好外,大多数鼓吹“西藏独立”,对我国政策进行不同程度的攻击和歪曲。外国许多知名人士和群众,由于对西藏的历史、现状和我国政策缺乏了解,很容易被欺骗和蒙蔽。当然,在对待国外“藏学”问题上,我们应当划清政治和学术的界限,把真正从事藏学研究的外国学者同那些打着研究“藏学”的旗号,图谋破坏我国的统一和藏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团结的人严格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对待方针。因此,加强对外宣传,及时揭露和批驳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反动谬论,正确开展国际学术斗争,以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一项十分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

众所周知,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文化遗产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缔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职责。远在7世纪,西藏的吐蕃王朝和唐朝就建立了密切

的关系，13 世纪元朝统一了中国，也统一了西藏地方，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西藏各族人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是主流，西藏地方同历代中央政权的关系也是密切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出现过曲折，甚至关系不正常的情况，这种历史现象，也曾出现于许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历史现象呢？应该从我国包括西藏当时总的社会状况、生活环境中去探索其本质原因。在我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时期，地域之间交通闭塞，除汉族之外，在北方和有些地方都曾经多次出现由其他较强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从这些总的社会状况来考察分析，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封建割据也就不足为怪了。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我国，也逐步侵入西藏地方，并进行了各种欺骗和挑拨，在西藏豢养出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20 世纪初叶出现的一股西藏“独立”的逆流，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在历史已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今天，如果再把历代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的关系说成“施主”和“被供养者”的关系，并以此鼓吹“西藏独立”，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重唱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的老调，违背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深入开展藏族的研究，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藏学，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的团结，发展藏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学术讨论会，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贯彻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学术流派在学术的百花园中各自去争芳竞艳。学术上的不同流派和见解是客观存在的，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探讨，将有助于对问题从纵向横向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在学术讨论中出现的某些片面性甚至错误，也是很难避免的客观事实，不必大惊小怪。

当前，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国各族人民正在掀起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确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万众一心地向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进军，这给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藏族和其他民族研究藏学的同志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不要把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引向民族关系方面。希望大家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中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的精神作为指导，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藏学的内容、任务和方法，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藏学的讨论、动员会，把这次讨论会开成一次藏族干部和学者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研究藏族的干部和学者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团结的大会。马克思主义藏学是我国社会科学百花园中的一枝鲜艳的鲜花。这次会议必将进一步把藏学者和全国致力于藏民族研究的其他各族学者们团结和组织起来，通过共同努力，使这枝鲜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1983年7月21日于拉萨

论藏区的远古文化遗存

藏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富有革命斗争传统，是我们伟大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光荣成员。考古学的材料证明：从远古时代开始，藏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今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带，并与祖国内地各民族的先民，结成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研究藏区的古文化遗存，对于认识这个整体形成及其发展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青藏高原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祥地

青藏高原是藏族的主要分布地。平均海拔四千多米，有“世界屋脊”或“世界第三极”之称，这里适不适宜远古人类居住，是不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一直是科学家们着力探索的问题之一。

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首先是考古资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学界不但在青海藏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在川边藏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而且还在西藏的定日、黑河、申扎、双湖、阿里发现了旧石器；在聂拉木、申扎、双湖发现了中石器；在林芝、墨脱、昌都、拉萨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物。这些发现说明：青藏高原曾是猿人、古人、新人的乐园，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祥地，是孕育我国各民族先民的摇篮之一。

其次是民间传说资料。藏族人民传说，在遥远的古代，喜马拉雅山地区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涛卷起波浪，搏击着长满松柏、铁杉和棕榈的海岸，发出“哗哗”的响声。岸边长满奇花异草，斑鹿、羚羊、犀牛、野象、兔子、杜鹃、画眉、百灵鸟等应有尽有。一天，海里突然出现一头巨大的五头毒龙，搅起万丈的海浪，摧毁了花草树木，所有飞禽走兽遭到了灾难性的袭击。正当它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大海的上空突然飘来五朵彩云，变成五部慧空行母，降服了五头毒龙，大地风平浪静，到处充满生机。飞禽走兽们求仙女留在凡间为众生谋利，于是五仙女喝令大海退去，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变成万顷良田，南边是花草茂盛的花园，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牧场。那五位仙女，变成今天喜马拉雅山祥寿、翠颜、贞慧、冠咏、施仁五个仙女峰，屹立在西南部边缘上，守卫着这幸福的乐园。那为首的翠颜仙女峰便是珠穆朗玛峰。^① 这个传说当然不尽可信，但也不能认为它毫无参考价值。拨开神话色彩，我们发现它具有反映历史真实的某些客观性。如它在叙述松柏、铁杉、棕榈及众多飞禽走兽在大海岸边出现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有人类共生，而在大海退去之后，才出现了与人类有关的良田、牧场。这是符合生物发展规律的。地质学资料认为，裸子植物——松柏、银杏等出现于古生代二叠纪，繁盛于中生代侏罗纪；哺乳类动物出现于中生代三叠纪，鸟类出现于中生代侏罗纪，至新生代第三纪，植物、动物逐渐接近现代，而人类出现于其后的新生代第四纪，因此，这个传说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青藏高原曾是人类发祥地的这个历史真实的。可以这样说，传说中提到的人类乐园，就是我们所说的孕育人类的摇篮，青藏高原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在这个摇篮中发展起来的人们的创造。

再次是地质资料，我国科学工作者多年进行的综合科学考察证明，在几十亿年前的元古代，青藏高原确实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从

^① 参见赤烈曲扎《西藏风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在昌都达马拉山两侧挖掘到的蜥脚类等第三类恐龙化石，在喜马拉雅山北坡吉隆县、聂拉木县和念青唐古拉山区比如县发现的三趾马化石以及丰富的白垩系、第三系海相、陆相植物化石来看，在距今一亿六千万年到一亿四千万年的侏罗纪早期和中期，它的东部昌都一带还处于浅海低陆的湿热环境，到上新世的二百五十万年以前，青藏藏区才逐渐上升为陆地，但地势并不高，自然景观接近亚热带类型。^① 现今青藏高原的地理特征，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断形成的。这就是说，在青藏高原形成的过程中，曾有过适宜古人类生息、繁衍的极为优良的自然环境，曾有过孕育人类和产生古代文明的重要时代。

最后是古人类学资料。迄今为止，古人类学家尚未在青藏和川西高原地区发现可能演变为人类的古猿化石及古人类化石，但是在它的毗连或邻近地区却有足以说明问题的此类发现。在我国云南省的开远小龙潭和禄丰县境内，在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北部的西瓦立克山区，都有“拉玛猿”（*Rama Pithicus*）化石的发现，这种古猿被公认为是最接近人类的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其生存于一千五百万年至一千万年以前，形似黑猩猩，面部短促，下腭拱出，牙有某些人齿的特点，能下地行走，主要活动于亚洲南部和非洲东部。大致属于亚洲南部的西藏高原，有这种古猿生存当是不成问题的。应该指出，拉玛猿还不是人，因为它们还不会制造工具。会不会劳动是猿与人的分界线，而猿演变为人类，就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②。古猿发展为

① 地质学家将地球的发展分为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等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代下为纪，如元古代下有震旦纪，古生代下有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留纪、石炭纪、二叠纪，中生代下有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新生代下有第三纪、第四纪。纪下有世，如第三纪有古新世（距今七千万年）、始新世（距今六千万年）、渐新世（距今四千万年）、中新世（距今二千五百万年）、上新世（距今一千二百万年），第四纪下有更新世（距今三百万年）、全新世（距今一万年）。人类出现在第四纪。旧石器时代以人类出现作为标志，也开始于新生代第四纪。

② [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142页。

会制造及使用工具的人，在体质特征上经历了猿人、古人和新人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在我国青藏高原邻近地区都有出土。如1965年5月，在云南元谋发现两枚猿人的牙齿化石，形态和北京猿人的同类遗骸近似，都属于直立猿人的类型，故被定名为“直立猿人元谋亚种”，简称“元谋人”^①，其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1963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泄湖镇陈家窝村及其附近公王岭的红色土中，出土猿人的下颌骨、头盖骨、面骨及牙齿化石，体质形态与元谋人一样，都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其生存年代为距今五十万至六十万年前。被定名为“蓝田中国猿人”，简称“蓝田人”^②，古人的化石于1922年出土于内蒙古伊克昭盟的乌审旗和审旗滴哨沟，被定名为“河套人”^③，新人化石发现于北京周口店龙骨顶部的山顶洞及四川资阳等地，被称为“山顶洞人”及“资阳人”，其体质形态已没有“猿”的特征，同现代人无显著区别。其生存年代大约距今一万八千年。^④ 这些人类化石的出土地，从宏观上看，都属青藏高原的毗连地区，从微观上说，都距青藏高原较远，我国学术界历来认为，黄河流域及华南地区，是这些人类的发祥地。西藏境内发现的大量的旧石器、细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是猿人、古人及新人留下的遗物，如果只承认黄河流域及华南地区是我国各族祖先的发祥地，那么，在西藏等藏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只能是从祖国内地迁去的人留下的，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它不能排除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祥地，那里的文化遗存是当地孕

① 参见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石兴永、周国兴《元谋人及其文化》，《文物》1978年第10期。

② 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下颌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第10期；吴新智、袁振新：《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地点1965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第1期。

③ 贾兰坡：《河套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版；吴汝康：《河套人类顶骨化石和股骨化石》，《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年第4期。

④ 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版；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育的人类遗物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青藏高原孕育的人类迁到祖国内地，并在华北、华南等地留下文化遗存的可能性。因此，青藏高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发祥地的结论，是能够成立的。

二 青藏藏区的远古文化

（一）黑河、霍霍西里、申扎、双湖等地的旧石器

1956年7月和8月，我国地质学家在西藏的黑河、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霍霍西里、托托河沿及格尔木等地，发现了十数件打击石器。石器大多分布在河谷两岸阶地的非原生层位的地表上，未见有磨光石器及陶片等遗物。

石器地点的海拔除格尔木的三岔口为3500米以外，其他三处（黑河、霍霍西里、托托河沿）都在4300米以上。在黑河采到石器2件，其中一件似有人工痕迹，另一件是长方形的石髓石核，长度为15毫米，发现于黑河西约二公里的山谷河岸上。在托托河沿采到石器2件，其中一件为黄色石髓制成的半圆形刮削器，长度为25毫米，由单面修琢而成，发现地点在托托河沿（乌兰木仑）之北约10公里的红色砂岩河岸上。在霍霍西里采到石器5件，皆有打制痕迹，多半是用河光石制成。其中砾石工具4件，仅在砾石之一端向一面加工，其余部分不加修整，另一件可能是石核，除去一大部分保留自然面外，其余部分都有打击的痕迹。另一件为石片工具，一面保留有自然磨蚀面，但四周都有向一面打制修整的痕迹，边沿呈弯曲形。发现地点在距霍霍西里南约20公里的曲水河河岸上。三岔口石器为石英岩石器，其一端有一面加工的痕迹，刃边呈锯齿形。发现地点距格尔木西南约

98 公里。^①

1976 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藏北高原申扎境内的珠洛勒、卢令和双湖境内的玛尼、绥绍拉等五处地点,采集到石片石器 14 件。特点是石片厚大,质料全部为角岩,多由狭长的石片或宽大于长的石片所制成,不少的石片上还保留着局部的砾石面。台面事先经过修整,是从石核上用直接打法制成。石器的修整比较细致,一般都从劈裂面向背面沿着边缘锤击加工,但在局部需要的地方也采取交互修整的方法。对于形状适当或局部锋刃合乎要求的石片,则往往不经加工而直接拿来使用。石器的器形可分为长刮器(6 件)、圆头刮器(5 件)、双边刮器(1 件)和尖状器(2 件)4 种。长刮器用厚背或厚脊的石片制成,在一长边加工成锋刃或遗有使用的痕迹;圆头刮器用厚脊的长条形或方形石片,沿两缘加工将一端修成弧形的刃缘;双边刮器为长条形,仅在两缘加工成刃缘,尖状器作隆脊的椭圆叶状,沿两缘修成钝尖,有的尖端交互修整,两缘加工也比较细致;有的两缘及尖端俱未加工,但遗有明显的使用痕迹。^②

另外,在藏南定日县的苏热地方,也发现了与申扎、双湖旧石器特点相同的旧石器。^③

上述旧石器的发现,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青藏高原就有人类居住,他们生活在河流的沿岸,或有成片沼泽地分布的地方,逐水草而居,以极简单的石制工具来进行采集和渔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太阳光、温度、空气湿度、食物及与自然作斗争方式等的不同影响,制造上述旧石器的人们逐渐形成为不同于欧罗巴、尼格罗人种的蒙古人种。就人种的共源和共同的特征来说,青藏藏区与祖国内地具

① 参见邱中郎《青藏高原旧石器的发现》,《古脊椎动物学报》1958 年第 2、3 期合刊。

② 参见安志敏、尹泽生、李炳元《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 年第 6 期。

③ 参见张森水《西藏定日发现的旧石器》,《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1976 年,第 105—109 页。